

金瓶梅紅樓夢縱橫後

沈天佑 著



287
《金瓶梅》《红楼梦》纵横谈

沈天佑 著

责任编辑：陆彬良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28千字

1990年5月第一版 1990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301-01032-X/I·184

定价：5.10元



作者照

序

《金瓶梅》和《红楼梦》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两个高峰，也是两部奇书。《红楼梦》在没有出版甚至还没脱稿时就已经受到人们的极大重视，对它的研究也随之开始。在封建文化统治下，《红楼梦》被归于淫书一类，但它冲破了这种压制，成为千家万户热爱之书，有“为人不读《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的说法。《红楼梦》研究，尤其在解放后，已经成为国内以至国外的一门特别的显学。至于《金瓶梅》，也是在未出版时便被文化学术界人士所注目，被看作是一部奇书。但因为有许多淫秽描写，妨碍了它的流传。现在它的思想艺术成就和价值日益被人们所认识，这部书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特殊重视，也就成为一门显学。

研究这两部书，各人有不同的角度。它们存在的问题很多。首先是作者问题。《红楼梦》的作者，胡适之考证出是曹雪芹，这个贡献很大，但到现在还有人怀疑。《金瓶梅》的作者问题更大，到目前也没有取得明确一致的论断。两位作者的生平家世也有不少问题和丰富的内容有待研究和发掘，可惜目前很难发现可靠的新资料。其次是版本问题。《金瓶梅》有好几种不同面目的版本，《红楼梦》的版本问题更多，光手抄本就存在不少复杂问题。于是作者和版本就成为一些研究者的重要课题。再者是名物问题。《金瓶梅》有许多名物问题，《红楼梦》也有名物问题。启功先生曾对《红楼梦》的名物作过注释，

使读者大为得益。一些研究者编了部《红楼梦辞典》，但工作还嫌不够。比如“红麝串”是什么，这是书中一个重要的细节，也还没弄清楚。

这两部书，尤其是《红楼梦》，内容上的问题就更多了。其中有许多地方不可解。于是就有猜谜派，专门对这些问题进行猜测。“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就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一些情节和重要人物，作者没有交代清楚。所以就有探佚派在这方面下功夫。另外还有关于语言及艺术技巧方面的研究，如此等等。当然还有人物派，这是小说思想艺术内容的一个方面，这就属于我下面讲的鉴赏派的范围。

看来这些不同角度的研究都是必要的。有些方面的研究已经颇有成绩，也有一些方面的研究者看来不大可能取得什么收获。我的管见，各种不同角度的研究，归根到底都应是为了帮助人们读懂这两部书。以读懂作品为中心的研究可以称作鉴赏派。

沈天佑同志在北大教书多年，他对这两部书的研究大都是关于思想艺术方面的，走的就是鉴赏派的路子。关于两部书的思想与艺术当前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和评价，各人的研究路数也不相同。在纷纭复杂的观点和方法中，我的管见也许是偏见，沈天佑同志的论文是比较稳健和平实的，对于研究者及一般初学青年都有参考价值，值得重视。

吴组缃

89年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目 录

序	吴组缃
---------	-----

谈明代的“四大奇书”	1
《金瓶梅》面面观及其价值	15
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别开生面的反面典型——西门庆	30
一个发人深思的悲剧人物——潘金莲	50
真切、完整的人物形象——李瓶儿	62
心高气傲、聪明狡黠的婢女——庞春梅	72
集古今帮闲大成的形象——应伯爵	81
屈从于市侩势力下的贵妇人——林太太	89

清代文坛上的三颗明珠

——纵谈《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	97
《红楼梦》——我国文学里的第一奇书	106
论《红楼梦》对《金瓶梅》的继承和发展	114
《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剖析	134
论贾宝玉其人及其典型意义	156
谈林黛玉形象的艺术魅力	174
内涵丰富复杂、耐人寻味的女子形象——薛宝钗	191
蕴含丰富、逼真动人的老妇人形象——贾母	208
论王熙凤和市侩主义	222
大观园里的改革家——探春	238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野心家——贾雨村	246

谈刘姥姥三进荣国府.....	255
《红楼梦》里的两大艺术波澜.....	268
谈《红楼梦》电视连续剧.....	284
后 记.....	296

谈明代的“四大奇书”

我国的古典文学的创作从宋代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长期以来以诗歌、散文为主的局面改观了,小说、戏剧这些新起的通俗文学逐渐成了文坛的主体。

在宋元话本的直接影响下,明代出现了大批白话长短篇小说,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等长篇巨著的出现尤其令人注目,它标志着我国小说创作已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明代人曾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为“四大奇书”。这里所指的“奇”,不仅仅指它的新奇有趣,引人入胜,不同一般;而且也还包含着对它们在思想和艺术上所取得的一系列创造性成就的肯定和赞美。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产生于元末明初;《西游记》、《金瓶梅》则产生于明代中叶之后。它们的出现至今都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在此期间,不知有多少小说(包括曾名噪一时的作品在内),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湮没无闻了,然而这四部巨著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赢得了历代人民的普遍喜爱。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作品经住了历史的考验,具有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我认为有下列几个值得人们深思和探讨的问题。

一、开辟了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新时代 形成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

科学社会主义告诉人们：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相互联系着的。所谓好与坏、美和丑都是相比较而言的。因此不能孤立地谈论这四部小说的价值，应该把它们放在我国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看它们在以往小说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又有了哪些新的重大的发展，它们又是怎样影响着后来的小说创作的。

我国小说的产生比起诗文来要晚，而且早期的小说是由历史派生出来的。所以古称小说为“稗官野史”。魏晋时代产生的大批“志怪”和“志人”小说的作者就是以史家的态度，如实地记载社会上神鬼怪异传说和文人学士中的逸闻佚事。很明显，在他们这些人的心目中，历史和小说是一码事。他们没能把历史和文学区别开来。严格说，这些“志怪”和“志人”小说只能说是小说的雏形，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小说创作。

从“志怪”、“志人”小说到唐代传奇小说，则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带有质变的一大进步。唐传奇写的再不是神鬼怪异的故事，而是发生在现实生活里的新奇可喜的事情。它们的作者也不再用史家的手法去如实地记载客观事实；而是在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创作。所写的故事情节力求曲折生动、文采华艳，并开始运用夸张、虚构的手法去塑造形象，因此明人胡应麟说：“凡变异之说，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层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少室山房笔丛》）对唐传奇不同于志怪等小说的变化，鲁迅更有精辟的分析，他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事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

因此，唐传奇已称得上是真正的小说创作。

在民间文艺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宋元话本小说，不仅在语言形式上采用了通俗生动的白话，从而开辟了我国白话小说创作的新纪元；而且在描写的对象和作品的思想内容上也与过去的小说迥然不同。作品着重反映的是广大市民群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因此，宋元话本小说的出现是我国文学史，特别是小说发展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事情，它对以后大批长短篇白话小说的产生有着直接、巨大的影响。

从魏晋的“志怪”、“志人”到唐代的传奇，再到宋元话本小说，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小说创作发展、前进的轨迹，反映出了我国小说创作如何由雏形渐趋成熟的过程。但不论是“志怪”、“志人”、唐代传奇还是宋元话本还都是短篇小说。在明代以前，我国文坛上还未曾出现过长篇小说。

元末明初《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出现，才开始了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新阶段。这里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章回小说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这是因为我国的长篇小说是在宋元的讲史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章回小说的形式由它的萌芽到成熟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的。

“讲史”说的是历代兴亡和战争的故事，如《全相平话五种》、《五代史平话》和《宣和遗事》等。“讲史”不能把一段历史有头有尾地在一两次说完，必须连讲若干次，甚至是几十次才能说完。每讲一次，就等于后来的一回。在每次讲说之前，要用题目向听众揭示主要内容，这就是章回小说里回目的起源。“讲史”的人为争取听众在下一次能继续来听，总是要选择故事情节发展最关键的地方，突然停下，这就是后来的章回小说每回的结尾处“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来历。

从章回小说里普遍出现的“话说”和“看官”等字样，也可以看出它和话本之间的继承关系。

元末明初出现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和之后出现的《西游记》、《金瓶梅》共同形成了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正是在这“四大奇书”的带动和影响之下,各类各样的长篇小说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开始了我国文学史上长篇小说辉煌发展的新时代。“四大奇书”不仅分别开拓和深入了我国小说描写的种种新的领域,而且在创作方法的发展、创新和艺术形象的典型化上都取得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成就。

二、《三国演义》引来了我国历史演义小说创作的热潮

《三国演义》出现之后,在它的巨大影响之下,出现了大批历史演义小说。上自开辟演义下至清宫演义,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多种历史演义小说。但其中具有较高思想和艺术价值、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却寥寥无几。这是因为不少历史演义小说的作者只是满足于把大批的历史资料加以组合、排比,并增添些奇突的野史逸闻以求其生动有趣,却未能在塑造艺术形象上去下气力,所以它们缺乏文学作品所应有的感人力量。

《三国演义》在这类小说中之所以成为一部出类拔萃的巨著,不仅由于它对自己所描写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鲜明的思想倾向,而且能在相当程度上突破历史上真人真事的束缚,根据文学创作典型化的手法去描写人物和故事情节。

《三国演义》虽取材于历史,但决不是通俗的历史教科书。在作者着重描写的魏、蜀、吴三国的兴衰过程中有自己鲜明的思想倾向,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都明显地背离了三国时期的历史。如小说的布局,在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割据中,是以刘备、曹操的关系作为主要的对立面的。刘备被放在正面地位,曹

操则放在反面地位。孙权这方面,从他抵抗曹操这点上来看,是作为刘备的同盟者的;而在和刘备的关系上,则又存在着对立的一面。在《三国演义》所描写的敌、我、友关系上,敌、我关系是主要的,朋友关系处在次要地位。在三国故事错综复杂、三国人物众多纷繁的描写中,作品紧紧抓住曹、刘这一矛盾主线,围绕它展开了一系列人物、故事的描写,而在这描写中,又以刘备集团放在正面的中心地位。这与历史显然是不符的。历史上不仅曹操方面的实力、地盘比刘备大得多,处于压倒的优势;而且孙权方面的实力、地盘也是刘备方面所不及的。《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就以曹魏为中心。但正是在《三国演义》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描写之中,鲜明地体现出了作者“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社会原因。因此《三国演义》是文学作品,而非历史著作。可以这样说,《三国演义》是以三国历史为基础,概括了较长时期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中不同政治集团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因此,它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具有很高的典型意义,这就与一般的历史演义小说有明显的不同。

《三国演义》的一个突出成就就是以文学典型化的手法塑造出了一系列帝王将相、文臣谋士的动人形象,其中有些形象如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周瑜等等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而其中的曹操,便与历史上的曹操颇不一致。历史上的曹操是封建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兴屯田、抑兼并,统一北方,在推动历史前进方面有不少有益的建树,可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从“拥刘反曹”思想倾向出发,把曹操塑造成了一个狡诈狠毒的“奸雄”典型。所谓“奸雄”,无非是说曹操有雄才大略,但心术不正,图谋篡逆。作者在曹操身上刻画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种种恶劣品质。如从历史的眼光看,小说这样描写曹操显然是严重的歪曲,诚如鲁迅所指出的:“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

真正方法。”(《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然而,《三国演义》毕竟是文学作品,并非历史著作,从文学创作要求看,这形象无疑是值得大加肯定的,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成功的反面典型之一,这一形象,长期来已深入人心。其他如诸葛亮、关羽等形象也都程度不同地离开了历史上真人的模子被典型化了。按历史记载: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三国志·诸葛亮传》)但小说吸取了民间传说中所赋予诸葛亮形象在军事上出奇制胜的本领。第一次在博望坡用兵,由于指挥得当,靠几千人马居然杀退了夏侯惇十万大军,使曹操胆战心惊。赤壁之战中,他孤身去东吴,不仅在身临危境中舌战群儒,和东吴上下文臣进行了一场复杂而又尖锐的斗争,最后争取到了强有力的同盟者;而且于战役部署的各个关键性环节上,都远远超过了周瑜和曹操,从而成了智慧的化身。《三国演义》正是以这些动人的人物形象,对人们起到了强烈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

《三国演义》另一突出成就是赋予三国时代的曹操、刘备、孙权这三个人物为首的三个封建统治集团的斗争以高度典型意义。

在小说所描写的一系列错综复杂、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真实、深入地揭示出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真实面貌和他们凶残狡诈的本质。小说所描写的政治斗争已撕去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说教的外衣,赤裸裸地暴露出它的凶残、罪恶的本相。各统治集团之间的联合和对立,合作和拚杀都是基于当时当地彼此间政治利益的一致或分歧。今天是亲密的朋友,明天就可以成为势不两立的仇人。这种激烈的政治斗争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朋友、家庭、婚姻等等各种关系中。总之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被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一切生活的形式,几乎都注入了政治斗争的内容,服从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其中出现的各式各样的战争描写尤为精彩动人。这

些战争描写已跳出了以往那种“两阵对圆，一刀一枪厮杀”的传统俗套，而是以人物为中心，把斗智斗勇和具体交战的描写结合起来，着重表现作战双方的战略战术。小说里所描写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这三大战役，正史的记载很简单也很概括。但《三国演义》的作者根据各种史料、笔记和传闻并结合自己丰富的生活体验加以大胆的想象，对这些战争的描写是绘声绘色、波澜起伏、跌宕跳跃、惊心动魄，并在那些引人入胜、精彩非凡的艺术描写里，深刻地反映出了战争中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决定一场战争胜负的，主要不是作战双方兵力的多寡、地盘的大小和物质条件的优劣，而是取决于统帅是否能知己知彼，是否能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制订出正确的战略战术，有没有能驾驭整个战争发展变化的能力；也决定于内部能否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充分调动谋士、武将乃至士兵的积极性。以官渡之战为例。这是发生在三国初期的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作战双方为袁绍和曹操。战役刚开始，袁绍一方无论在地理、兵力、物资条件诸方面都拥有压倒优势，处于十分主动的地位；而曹操则相反。但战争结果却是袁绍失败了，曹操胜利了，从此统一了北方。小说生动具体地描写出了出现这一始料不及结果的原因是袁绍首先在战略方针上失误，其次是他不能采纳部下的正确意见，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而且在决策机构内部，相互猜忌、勾心斗角，致使原有的种种有利条件逐渐丧失导致最后的失败。同时生动地描写出曹操在战略上采取的正确方针，以及他能虚心听取和采纳手下各种正确意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还能利用敌人弱点，不断削弱敌人原有的种种优势，使自己由劣势逐渐转为优势，由被动转为主动，从而获得最后胜利。《三国演义》在战争描写中所揭示出来的这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今天依然对人们起着多方面的启示作用。

在《三国演义》惊心动魄的战争描写里，各种人物形象十分鲜明生动。如通过赤壁之战那样异常尖锐、激烈、复杂的矛盾冲突，把

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周瑜的英雄才略、鲁肃的诚直忠厚、黄盖的赤胆忠心、阚泽的机智大胆乃至蒋干的愚而好胜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水浒传》为我国大批英雄 传奇创作树立了光辉榜样

和《三国演义》产生于同一时代的《水浒传》是我国古典小说中又一部不朽名著。

《水浒传》写的是发生在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不过是中国历史上千百次农民起义中的一次，在历史上并不引人注目，也没有多大的代表性。但《水浒传》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基本上摆脱了史实的束缚，通过自己对动乱年代农民起义的深刻观察、体验，结合民间传说中有宋江造反的种种传说，赋予了这次农民起义以高度的典型性。小说通过描写宋江起义，深刻地揭示出了我国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发生、发展以至最后失败的整个过程。其中特别成功的是深入挖掘出了产生中国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小说虽然没有正面从经济关系上广泛描写阶级矛盾，但对于作为起义英雄对立面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极端黑暗和腐朽则有深刻的揭露，从而在艺术创作上深刻总结出了中国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特征——逼上梁山。

《水浒传》思想上一个难能可贵之处是把那些历来为封建统治阶级视作“盗贼草寇”的革命者放在小说的正面地位加以肯定、歌颂。作者倾注了全部的爱慕和赞美之情，去描写他们的斗争精神和光辉品质。这种对农民起义的肯定和歌颂，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

《水浒传》在人物形象的典型化方面有比《三国演义》更为巨大的成就，具体表现在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上。如梁山义军领

袖宋江就是个具有复杂性格的成功艺术典型。小说里的宋江形象不仅和历史传记中的那个“勇悍狂侠”的宋江不同；也和讲史话本《宣和遗事》中写的那个具有豪爽性格的宋江不一样，是作者崭新的艺术创造。这种创造是作者在接受民间传说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动乱时代农民起义的深刻认识，通过集中、概括而创造出来的。

宋江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集中地表现在他性格里的反抗性和妥协性的对立和统一。如宋江一方面反对贪官污吏的残害百姓；但又深信皇帝是好的、圣明的。每当压迫者和反抗者之间发生尖锐冲突时，他总是从“义”出发，站在被压迫者和反抗者的一面，所以他同情并支持晁盖等人的反抗活动；但在道义上又认为他们的行动是非法的。他支持江湖上的好汉们投靠梁山，但自己则迟迟不肯上山。总之，宋江性格中的反抗性和妥协性的对立统一，贯串于人物行动的各个方面。这种反抗性和妥协性来自宋江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忠义观念。而这种忠义观念的形成，不仅和宋江本人的出身、经历教养和地位有关；同时也和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紧密相联。

《水浒传》在人物形象的描写中，开始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注意。这方面集中地表现在林冲性格的发展上。作为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他的教头的地位，优厚的待遇，舒适的家庭，漂亮的妻子，这些特殊条件，形成了他安于现状，怯于反抗的性格。高衙内明目张胆地调戏他的妻子，他固然感到耻辱但不敢下手，只是冲散了事。后来在高俅父子的多次阴谋陷害之下，虽感到含冤负屈，仍未能起而反抗，最后在家破人亡，步步受逼的情况下，他实在忍无可忍才杀死了仇敌，吐出了长期郁积于胸中的冤气，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起义的道路。小说具体生动地刻画了他的性格，在一次一次的侮辱迫害中，不得不一步一步地发生的明显的变化。

《水浒传》在人物形象典型化方面所取得的上述成就使它在我国小说人物塑造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三国演义》固然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鲜明、深刻的人物形象,但这些形象还存有明显不足之处,表现为性格内涵比较单一,不够丰富复杂,而且人物的性格总是一成不变,这是和现实中的真人有距离的,因此这种人物形象被人称之为类型化的典型,而《水浒》,却开始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它的发展。《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已不再和《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形象一样,属于类型化;而是开始了由类型化向性格化典型发展了。

《水浒传》后出现的一些比较有影响的英雄传奇小说,都无不是程度不同地汲取了《水浒传》上述思想和艺术成就的作品。

四、《西游记》别开生面地带 出了一大批神魔小说

《西游记》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开拓了神魔小说的新领域,正是在《西游记》的启迪、影响之下,部分作者把自己的兴趣爱好转向了超现实的神灵妖魔,创作出了各色各样的神魔小说,给了广大读者以十分奇突的艺术感受。但这类神魔小说的大多数却没有能汲取《西游记》创作的精萃,只一味地热衷于离奇荒诞的构思,变化莫测的故事情节和充满神秘色彩的超现实形象的描绘,缺乏必要的现实性和真实性,因此,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为人们所淡忘。《西游记》之不同于它们的是在小说所写的神魔故事里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

《西游记》的一个突出成就就是塑造了神话英雄孙悟空这个脍炙人口的形象。这一形象之所以长期得到群众的普遍喜爱、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是因为它深深地扎根于群众生活的土壤之中。